

一、2014 年「亞信」峰會觀察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蔡明彥教授主稿

- 大陸將 2014 年外交特點訂為「主場外交」，並將「亞信峰會」與「亞太經合會」領導人非正式會晤列為今年「主場外交」兩大重點會議。
- 大陸透過「亞洲區域主義」及「亞洲意識」的操作，結合「中俄戰略合作」，反制美國對亞洲事務的干預。
- 本次峰會通過「上海宣言」，重點在於反美、反恐、加強區域一體化及推動交通運輸合作，然內容僅具宣示性與象徵性意義。

(一)「亞信」的成立與運作背景

「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簡稱「亞信」)第 4 次峰會於今(2014)年 5 月 20 日至 21 日在上海舉行。大陸是「亞信」創始成員國，於 2014 年至 2016 年期間首次擔任主席國。「亞信」是由哈薩克總統納紮爾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yev)在 1992 年提議成立，當時因冷戰結束後國際情勢出現重大變化，因此希望利用「亞信」在亞洲建立起推展安全對話與合作的區域機制。

「亞信」雖在 1996 年召開第 1 次副外長級會議、1999 年舉辦第 1 次外長會議，但一直到 2002 年才舉行首次高峰會，原因是為了因應 2001 年 911 恐怖攻擊事件對國際安全帶來的衝擊。正因如此，「反恐」一直是歷年來「亞信」峰會重要議題之一。

目前「亞信」已由創始時的 16 個成員國，發展成 24 個成員國和 13 個觀察員國家及國際組織。「亞信」的 24 個成員國包括：大陸、阿富汗、亞塞拜然、埃及、印度、伊朗、以色列、哈薩克、吉爾吉斯、蒙古、巴基斯坦、巴勒斯坦、俄羅斯、塔吉克、土耳其、烏茲別克、泰國、南韓、約旦、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越南、伊拉克、巴林和柬埔寨。另外，13 個觀察員國家與國際組織則有印尼、馬來西亞、美國、卡達、烏克蘭、日本、

孟加拉、菲律賓、斯里蘭卡，以及聯合國、歐安組織、阿拉伯國家聯盟、突厥語國家議會大會。

基本上，「亞信」成員國以亞洲大陸國家為主，因偏重於處理亞洲大陸的安全事務，俄國與大陸自然成為「亞信」最重要的兩大國家。至於美國、日本這類亞太地區的海洋國家都只擁有「亞信」觀察員國家身份，這也讓「亞信」成為繼「上海合作組織」（簡稱「上合」）之外，另一個排除美、日擔任重要角色的區域對話機制。而這樣的成員結構與發展背景，也讓本次「亞信」峰會成為大陸與俄國在外交上聯合反制美國的重要舞臺。

（二）本次峰會的特色與成果

今年「亞信」峰會是歷年來規模最大、出席國家最多的一次，計有46個國家和國際組織領導人、負責人或代表與會，包括11位國家元首、1位政府首長及10位國際組織負責人參加會議。出席本次峰會的外國領導人包括：俄國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哈薩克總統納扎爾巴耶夫、吉爾吉斯總統阿塔姆巴耶夫（Almazbek Atambayev）、伊朗總統魯哈尼（Hassan Rouhani）等人。在「亞信」峰會舉行期間，各種多邊與雙邊外交活動將同時在上海進行，這讓大陸有機會利用「亞信」的外交舞臺凸顯其區域大國角色。

早在今年「兩會」期間，大陸外長王毅便對外表示，2014年大陸外交的主要特點將是「主場外交」，並且將「亞信」峰會與「亞太經合會」領導人非正式會晤列為今年大陸發揮「主場外交」的兩大重點會議。大陸將此次上海「亞信」峰會的主題訂為「加強對話、信任與協作，共建和平、穩定與合作的新亞洲」，試圖提出亞洲國家對於安全合作的新觀念與新立場，藉以提升大陸對於亞洲事務的發言權與主導權。

本次峰會的主要成果在於通過「上海宣言」，內容包括：1.任何國家不能以犧牲別國安全為代價加強自身安全；2.亞洲傳統、文化和價值觀具多樣性，應推進跨文化、文明、信仰之間的廣泛對話；3.國際社會應該按照「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共同打擊所有形式的恐怖主義；4.各國應共同努力推進區域一體化，特別是加強運輸及物流系統，提升區域和國際交通運輸合作；5.防範恐怖主義、暴力極端主義和毒品威脅阿富汗和本地

區內外的安全與穩定。前述內容涵蓋政治、外交、經貿、反恐、交通建設等議題，範圍相當廣泛，顯示各國希藉由「亞信」此一多邊平臺，針對區域國家關切的經濟與安全議題提出共同看法，爭取國際社會對於亞洲國家新安全觀與外交立場的重視。

（三）大陸在本次峰會的外交操作

大陸身為第 4 次「亞信」峰會的主席國，會議期間在外交上的操作有幾點值得重視：

1. 強調「亞洲安全觀」

習近平於 5 月 21 日在本次「亞信」峰會上進行開幕演說，倡議「亞信」組織建立亞洲安全合作新架構，並且強調亞洲安全和亞洲以外的國家無關，「亞洲的事情，歸根結底要靠亞洲人民辦」、「強化針對第三方的軍事同盟，不利於維護地區共同安全」。一般認為，相關談話係針對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總統提出「亞太再平衡」戰略而來。尤其今年 4 月歐巴馬訪問亞洲國家，加強和美國亞洲盟國（包括日本、南韓、菲律賓）的同盟合作關係，大陸方面認為美國此舉是針對其所進行的「軟圍堵」，因此習近平透過「亞信」峰會暗批美國對亞洲事務的干涉，希望透過「亞洲區域主義」及「亞洲意識」的操作，反制美國在亞洲地區的外交與軍事介入。

2. 加強「中」俄戰略與軍事合作

大陸與俄國是「亞信」成員國中最重要的兩個大國，雙方刻意利用本次「亞信」峰會凸顯兩國戰略合作關係，反制美國霸權角色。習近平在「亞信」峰會上指出：「中國同俄羅斯共同提出亞太安全與合作倡議，為鞏固與維護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發揮重要作用」。同時，大陸與俄國利用本屆上海「亞信」峰會召開之際，舉行為期 7 天的「海上聯合 2014」聯合軍事演習，動員各式新型船艦參演，並由兩國領導人親自出席演習開幕儀式。另外，習近平與普丁針對美國所指控的網路駭客入侵行為，也反擊指出「當前資訊通信技術被用於和維護國際穩定與安全目的相悖、損害國家主權和個人隱私的行為」，用以表達大陸與俄國對美國全球監聽計畫的不滿。由於大陸對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抱持戒心，加上俄國因克里米亞

問題和美國關係陷入低潮，促使「中」俄利用這次「亞信」峰會宣示加強雙邊外交、軍事戰略、能源合作的決心。

3. 引進經濟與交通運輸合作議題

在本次「亞信」峰會中，大陸試圖透過「一帶一路」——「新絲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兩大計畫的開展，加強「亞信」成員國在經濟領域的合作。目前大陸正積極推動「中國—巴基斯坦經濟走廊」、「孟加拉—中國—印度—緬甸經濟走廊」以及其他的「西進」戰略，因此在本次「亞信」峰會中，大陸積極提倡加強運輸、物流系統整合，提升區域國家之間交通運輸合作，尋求擴大大陸和亞洲西部國家發展經濟合作與互連互通的機會。

4. 提升反恐合作

自 911 事件發生後，反恐合作一直是「亞信」關注的重要議題。近期大陸西部省分紛傳暴力攻擊事件，在「亞信」峰會召開期間，新疆更在 5 月 22 日傳出大型爆炸案，造成至少 31 人死亡、近百人受傷。另外，中亞與南亞國家面臨恐怖主義威脅也相當嚴重。尤其阿富汗國內情勢極不穩定，一旦對外輸出恐怖主義將對區域安全帶來重大衝擊。為此，大陸藉由「亞信」峰會的機會，呼籲亞洲大陸國家加強打擊恐怖主義、跨國犯罪、製毒販毒等領域的合作，藉以維護大陸周邊與陸疆地區的安全與穩定。

(四)「亞信」的未來前景

目前「亞信」雖已建立起高峰會、外長會議、高官委員會會議等 3 種機制，並且設立秘書處和主席國工作組等機構，討論區域內的安全及經濟合作問題，但主要功能仍限於跨國對話。在共識決的運作機制之下，1999 年「亞信」外長會議曾簽署「亞信成員國相互關係指導原則宣言」，重申成員國遵守「聯合國憲章」、相互尊重主權平等、彼此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等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另外，2002 年「亞信」峰會也通過「阿拉木圖文件」，確定「亞信」的目標和宗旨在於增進亞洲和平、安全與穩定。本屆「亞信」峰會雖通過「上海宣言」，但這類文件的內容常流於形式，徒具宣示性與象徵性意義，缺乏實質拘束力。

再者，「亞信」雖高度重視經濟與反恐合作議題，但其功能與「上合」明顯重疊，而且缺乏「上合」的常設性機構負責擬定與執行具體合作計畫，加上「亞信」成員國之間的政治體制、意識型態、利益關切差異頗大，均讓「亞信」要發揮重要的區域安全決策與爭端解決功能，面臨許多實際上的限制。

二、論習近平的「亞洲安全觀」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趙春山教授主稿

- 習近平在 2014 年「亞信」峰會提出由「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四項理念組成的「亞洲安全觀」。
- 習近平的「亞洲安全觀」延續過去江澤民倡議的「新安全觀」，但突出當前周邊安全形勢的變化。
- 大陸希望參與主導建構新的亞洲安全秩序，對美國雖有若干針對性，但不會選擇與美國衝突。

今年 5 月 21 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上海召開的「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第 4 次峰會（簡稱「亞信」峰會）上，提出由「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四項理念組成的「亞洲安全觀」，並將其納入會後發表的「上海宣言」中。

安全是任何國家的核心利益，而確保國家安全則是要為國家的生存和發展，提供有利的憑藉。因此，制定國家安全戰略，必須同時兼顧內部安全和外部安全。「亞洲安全觀」的提出，是習近平上臺後，在對外政策方面的一項重要論述，目的是宣達地區安全理念，構築地區安全平臺，「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托」，來為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後提出的「總體國家安全觀」服務。

（一）安全形勢評估影響外交戰略

習近平提出的「總體國家安全觀」時，特別強調要「準確把握國家安全形勢變化新特點、新趨勢，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針對安全形勢變化的問題，習近平認為當前大陸國家安全「內涵和外延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豐富，時空領域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寬廣，內外因素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複雜」。因此，分析習近平倡議的「亞洲安全觀」，我們不能忽視地區形勢變化造成的影響。

回顧中國大陸建政以來的歷史，領導階層對國家安全形勢的認知，常常是決定大陸外交戰略的主要變數。例如，中共在建政初期視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為主要安全威脅，因此在外交上採取「一邊倒」戰略，希望在蘇聯的保護傘下渡過危機；進入 1960 年代，由於中共、蘇共的衝突步步升高，中共有面臨東西兩面作戰的危險，故外交上採取「反美反蘇與世界革命」的戰略；1970 年代後，蘇聯成為大陸安全威脅的主要來源，而美國基於戰略考量開始嘗試與中共接觸。由於美國、中共、蘇聯三角戰略關係的改變，中共隨後採取「聯美抗蘇」的「一條線」戰略；進入 1980 年代，為創造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的有利環境，大陸標榜採取「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戰略」，意圖以不結盟來增加大陸在國際社會的安全迴旋空間。

（二）江澤民的新安全觀

1989 年江澤民上臺後，鑒於冷戰結束國際形勢的劇烈變動，在外交戰略上提出了一些新的思維。其中最重要的是，針對當時亞太地區形勢的特點，於 1997 年正式提出要「確立新的具有普遍意義的安全觀」。何謂新安全觀？與舊安全觀相比，其創新之處在那裡？對此，大陸學者徐堅作了下列的詮釋：

就「國際安全保障的基本條件」而言，新安全觀認為，國際安全的基礎是共同的安全利益、相互信任、經濟發展及經濟利益的融合和多種文明的和諧共處，而不是傳統安全觀念所強調的實力優勢、軍事同盟、一致的政治制度及一元化的價值觀念。

就「國際安全和威脅來源」而言，新安全觀認為國際安全所面臨的威脅，取決於國家之間的政治關係和國家對外政策的動機和意圖，而不是實力差距和實力對比的變化；認為非傳統安全因素對國際社會的威脅，需要靠國際社會採取聯合行動來對付，進行綜合治理，而非靠排他性合作或單獨的行動。

就「維護國際安全的途徑」而言，新安全觀認為最佳方法是以平等對話和互利合作尋求共同安全，而不是以結盟對抗和加強軍備尋求單方面安全。

就「國際安全合作的方式」而言，新安全觀認為安全合作不僅應考慮發展模式和觀點一致國家之間的合作，也應尋求發展模式和觀點不一致的

國家之間的合作。

由此可見，江澤民強調的安全觀是一種「相對的安全」，而不是「絕對的安全」，並排除以軍力作為尋求安全的唯一手段。探討江澤民的新安全觀，「蘇東劇變」是重要的背景。從中共的觀點看，蘇聯解體和東歐的民主化誠然有其內在的因素，但西方對社會主義國家實施的「和平演變戰略」，也發揮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大陸此刻面臨的安全課題是：如何維護共黨的專政地位，避免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另一個倒下的骨牌。

（三）習近平的「亞洲安全觀」

與 80 年代比較，中國大陸今天所處的國際環境也相當嚴峻。不可否認，大陸綜合國力的大幅提升，加強了中共領導人的戰略自信。但在外界看來，大陸戰略自信提升，也可能成為加劇區域情勢緊張的一個來源。明顯的是，受到東海和南海領土爭議的影響，大陸和周邊國家的關係劍拔弩張；而美國實施亞洲再平衡政策，以及美國強化與地區盟國的關係，也讓中國大陸有腹背受敵、遭到圍堵的感覺。因此，基於安全利益的考量，習近平上臺後即把周邊國家視為外交的優先課題；其提出「亞洲安全觀」的主張，目的也是為了落實「穩定周邊，立足亞太，面向世界」的戰略方針。習近平聲稱：所謂「共同」，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一個國家的安全；「綜合」就是要統籌維護傳統領域和非傳統領域的安全；「合作」就是要通過對話合作促進各國和本地區安全；「可持續」就是要發展和安全並重，以實現持久安全。

習近平的「亞洲安全觀」強調「合」和「共」的概念，基本上並沒有脫離江澤民當初所提新安全觀的內涵，只是進一步加以深化而已。但與過去不同的是，習近平的論述突出「亞洲的事務由亞洲國家主導解決」、「亞洲安全要靠亞洲人民來維護」。其中雖然暗指美國，有針對性，但不是選擇要與美國衝突；相反地，如果大陸在建構亞洲安全秩序的過程中取得主導地位，則可以增加其與美國建立新型大國關係時討價還價的籌碼，也可以消除周邊國家對大陸崛起的疑懼，為習李體制刻正進行的龐大改革計劃，營造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

三、中共「十八大」後大陸網路治理政策趨勢研析

成功大學政治系暨政經所洪敬富副教授主稿

- 截至 2013 年 12 月，大陸網民總人口已達 6.18 億，手機網民為 5 億，網路普及率為 45.8%。
- 大陸官方充分認識到網路虛擬世界對黨國宣傳體制之衝擊與影響，強調要奪取網路輿論鬥爭主動權、壯大網上輿論主流陣地、堅守宣傳思想主陣地；並成立「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回應來自大陸和海外網路世界的挑戰。
- 「中國夢」在網路治理上的統治思維，即為發展健康向上的網路文化；俾掌握虛擬世界的話語權及意識型態領域的主動權，強化和完善黨國體制在新媒體時代的執政與決策能力。

(一) 從中央到地方分別成立各級「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

根據大陸「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於 2014 年 1 月 16 日所發布之「第 33 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 2013 年 12 月，大陸網民總人口已達 6.18 億，手機網民為 5 億人口，網路普及率為 45.8%。顯示網路已成為大陸人民不可或缺的重要溝通與傳播載具。隨著資訊科技不斷地高速創新與發展，公眾的參與意識抬頭，致使黨國體制的資訊壟斷能力也愈發下降。近幾年來，大陸層出不窮的群體性事件、維權事件，以及網路圍觀、網路問政、網路監督等，大都以網路為媒介而號召、興起及行動。易言之，這些群體性事件多以網路為中介平臺進行事件討論、資訊聯繫與線下行動串連。大陸官方也充分認識到網路虛擬世界對黨國宣傳體制所帶來之衝擊與影響，不斷強調要奪取網路輿論鬥爭主動權、不斷壯大網上輿論主流陣地、堅守宣傳思想主陣地，並要求宣傳思想部門需「守土有責、守土負責、守土盡責」(人民日報，2013.8.21)。

大陸於 2014 年 2 月成立「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即是回應大

陸和海外網路世界挑戰的一項重要治理作為。該領導小組由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擔任組長，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和主管宣傳與意識形態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劉雲山任副組長。這項攸關大陸網路治理的「頂層設計」，旨在統籌並協調大陸各個領域的網路安全和資訊化等重大問題；同時，該小組亦肩負制定和實施大陸國家網路安全、資訊化發展戰略、宏觀規劃和重大政策的使命。習近平在主持和召開該小組的第一次會議時，直言：「沒有網路安全，就沒有國家安全；沒有信息化，就沒有現代化」（新華網，2014.2.27）。對大陸當局而言，這除是其網路安全和資訊化國家戰略的重要治理作為，也標誌著擁有 6 億網民的大陸，從「網路大國」加速向「網路強國」邁進。

事實上，大陸「網路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的成立，正是呼應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之「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習近平在相關說明中即直言：「面對互聯網技術和應用飛速發展，現行管理體制存在明顯弊端，多頭管理、職能交叉、權責不一、效率不高」（新華網，2013.11.15）。近期，大陸江西、陝西等地，也相繼成立網路安全小組。其中，北京市委於 2014 年 5 月 7 日決定成立市委網路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由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任組長，市委副書記、市長王安順任副組長），由於北京為大陸的「網都」，其「網路資源豐富，知名網站雲集，信息化程度高，在國家網路安全和信息化建設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後續發展，值予觀察（北京日報，2014.5.8）。

（二）「中國夢」下建構一個「新型的網路大國」

大陸中央和地方設立之「網路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正對其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軍事等各領域的網路安全和資訊化發展問題，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特別是在今（2014）年 4 月 15 日至 11 月展開的「掃黃打黑·淨網 2014 專項行動」，針對大陸網路世界的「非法出版物」、「淫穢色情文化垃圾」、「假媒體、假記者站、假記者」（三假）大力掃蕩（新華網，2014.3.31）。包括新浪、鳳凰、搜狐等多家知名網站皆因內容違規遭查處，或者受到牽連。大陸官方的宣傳指稱：「互聯網企業積極參與，認真開展自查自糾，開通網民舉報管道，自覺接受公眾監督，建立健全淫穢色情信息快速處置

機制等，使得網絡環境不斷淨化」(人民日報，2014.5.6)。這也是在習李新政下，貫徹實行習近平有關「合國情、順民心、接地氣」和「弘揚正能量、共築中國夢」的重要講話(新華網，2013.2.21；人民日報，2014.1.18)。換言之，這項淨網行動加強對當前大陸新聞媒體、文化出版和微博、微信等網際網路的控制。

誠然，大陸自 1994 年開始與國際網路體系接軌，至今已有 20 載，其對網路的控制與治理是不斷地強化且與時俱進。大陸官方深知，網路科技是現代化國家強化經濟發展的利器，它同時有可能進一步協助實現大陸百年來懷抱「既富且強」的國家宏大願景。在此發展思維下，大陸官方為深化經濟改革並推進全球產業競爭力，欲充分利用高新科技帶動其經濟成長的同時，也加強對虛擬世界的網路治理作為，如完善網路通訊有關法規和加大管控網路「失序」的活動(如各式各類的網路犯罪、賭博或色情傳播等)，以及對政治異議言論或訊息的監控，以防杜或減低網路科技可能帶來社會自由化、民主化(或是任何可能的顏色革命)的衝擊與影響。

習近平自 2012 年 11 月就任中共總書記以來，在大陸內部和國際多個場合中，多次就「中國夢」的具體內涵、奮鬥目標、總體布局和實現路徑等發表講話(人民網，2013.6.19)。「中國夢」的提出，不僅是一種至高的統治意識型態範式，亦是「習李體制」執政的重要理論根基。而「中國夢」在網路治理上的統治思維，即為發展健康向上的網路文化，這正是大陸黨國大眾傳媒的輿論武器特性，運用其享有之網路優勢來進行新聞輿論工作，俾利牢牢掌握虛擬世界的話語權，以及意識型態領域的主動權，強化和完善黨國體制在新媒體時代的執政與決策能力。換言之，這也呼應前中共總書記江澤民於 2001 年 7 月 11 日對網路治理工作所做的原則性宣示：「積極發展、加強控制、揚善隱惡、為我所用」(新華網，2001.7.12)。究其根本，新興網路科技在大陸當局的眼中，不僅是要服務經濟(如「電子商務」或「財政再集權」)，也是要為政治(如黨國政體的權威性和正當性)和社會(如減緩社會矛盾與增強社會穩定)而服務的。這是當前大陸在「中國夢」宣傳主旋律下，建構一個「新型的網路大國」的思考所在。

四、人民幣國際化的省思

臺灣大學經濟系林建甫教授 主稿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彭思遠助理研究員

- 人民幣國際化為習李金融改革之代表性政策，惟推動前如未能先完成「利率市場化」及「人民幣自由兌換」，可能對大陸金融及經濟造成負面影響。
- 人民幣國際化勢在必行，目前多個國家競相角逐人民幣離岸中心，態度積極，我方亦應把握優勢與契機。

（一）人民幣國際化之前提與風險

今年年初以來，人民幣波動幅度加大，特別是在市場毫無心理準備之下，無預警地大貶值。2月28日人民幣單日重挫近1%，創下2005年大陸匯改以來8年間單日最大跌幅，其後更一路下挫，累積跌幅一度高達3%；而4月底以來又出現觸底反彈之勢，忽高忽低的走勢跌破許多專家的眼鏡，市場各種臆測、傳言不斷。

就客觀的角度來看，人民幣的波動是受到「人民幣國際化」及「經濟成長趨緩」兩大因素的影響。

首先，去年以來，習李上臺後大力推動改革，金融改革被列為推動重點，其中人民幣國際化更是其代表性政策之一，人民幣走勢因而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不過人民幣國際化並非一蹴可幾，必須先完成「利率市場化」及「人民幣自由兌換」。就匯市的角度來看，只要有利差存在，熱錢的套利行為就不會停止，加上大陸銀行存款利率上限與民間借貸利率差距極大，加大套利利潤增加的想像空間，又因銀行公告利率與實值借貸利率的差異，讓熱錢炒手有更多的操作空間，假若未完成「利率市場化」就讓人民幣自由波動，匯價恐怕將會是一天三市，不僅衝擊大陸總體經濟，更可能產生金融風暴。

其次，「人民幣自由兌換」是成為國際貨幣的必要條件。然而，當前

透過貿易的管道進入的熱錢問題嚴重，不僅管理上的難度提升，更因為其目的並非實質投資，造成貿易金額不正常的放大，出口數值甚至內容失真。因此，倒不如開放人民幣的自由兌換，讓想投資的資金經由合法管道進入，加強貿易帳的管控，以減輕風險。

但貨幣自由兌換不可操之過急，要先獲得國際市場的廣泛認可和接受，發揮計價單位、交換媒介和價值儲藏的功能，才能成為國際結算、投資和儲備的貨幣。而且還需完善與各國央行的貨幣互換協議、建立健全交易市場及金融風暴防範機制，最後才能讓人民幣完全自由兌換。或許市場對於大陸官方下重藥加快進程的憂心，都反應在近日人民幣的貶值。

（二）人民幣國際化勢在必行

在經濟方面，大陸今年第一季 GDP 降至 7.4%，不僅低於大陸官方設定的 7.5% 增長目標，創下一年半來成長新低，同時更平了 2012 年第三季所創下的 24 年來新低水準。其中進出口總額比去年減少 1.0%，貿易順差借 167.4 億美元，大減 59.7%；固定資產投資比去年同期增加 17.6%，但成長率比起去年少了 3.3%；大陸第一季零售銷售成長率亦是 2009 年以來的新低點。外貿不振、投資衰退以及消費力道減弱的不安因素仍然存在；大陸總體經濟疲軟的態勢，非常明顯。

短期來看，美國聯準會對 QE 退場的表態及國際經濟情勢等因素，也都加大人民幣下跌壓力。不過若是拉長期間來看，大陸經濟穩定成長的可能性還是較高，出口維持順差、利差空間仍然存在、全球最多的外匯存底等因素都能支持人民幣，加上人民幣國際化是習李政績指標，大陸官方坐視人民幣長期貶值的可能性不大。

不論如何，人民幣國際化是一個必須把握的契機。約略估算，大陸的資本帳戶完全開放之後，以大陸現有家計單位的儲蓄總額 45 兆人民幣計算，如果有 10% 的資金從事海外投資，就是 22 兆新臺幣的規模，換算為臺灣 2014 年歲入預算（1 兆 7 千億）的近 13 倍，商機驚人。

目前，許多國家都在爭取人民幣離岸交易中心，包括新加坡、英國倫敦以及德國法蘭克福等，態度均相當積極。臺灣相對於這些競爭者，確實

搶得先機，不僅率先簽署海峽兩岸貨幣清算合作備忘錄，繼香港之後成為世界第二個人民幣清算中心，而且在條件待遇上，比香港更加優惠（香港人民幣帳戶僅可匯出到大陸「同名」帳戶，臺灣則可以匯到大陸「不同名」帳戶，靈活性明顯優於香港）；此外，我國內開放銀行承作人民幣存放款業務以來，成長力驚人，人民幣存款餘額早已破新臺幣兆元大關。若從兩岸金融合作的思維切入，臺灣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與人民幣國際化相輔相成；對於臺灣而言，也是轉型升級的良機。